

评审会前打招呼，名堂多多

本报记者 高博

■两会话题

“一个重要的评审会前，我们首先要搞到名单，看看各自认识哪些专家，分头‘打招呼’。”3月7日，科技界小组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郑兰荪说。
“我跟某某评委很熟，再去打招呼，没有必要……”郑兰荪跟同事说。
同事答：“不行！这是规矩——发个短信、打个招呼，是为说明‘这次欠了你的账……’。”

“评审会变成利益交换。我支持你，你支持我，像分赃一样。搞完学术评审会，心情非常不愉快。”郑兰荪说，为了团体和下面的年轻教师，他不得不“搞”。
同一会场的潘建伟委员说，常见如此评审：评A的学生，A离场；评B的学生，B离场；其实A和B互相支持对方的学生。
“打招呼”不是这两年才有。一位著名生物学家2010年告诉媒体：“有个科研经费没有给我带领的梯

队，评委私下反馈说：××看不起我们，不给评委打招呼。”
“我的学生酒量现在都非常好；我学生的学生，30岁不到，被逼着拼命喝酒，真是逼良为娼。”郑兰荪说，“我不敢多劝，怕害了他们——像我们一样不会交际，不会公关，生存不下去。”
南京大学教授高抒告诉科技日报，他从来不“打招呼”。因为他批评过“打招呼”，不愿自相矛盾。但同事和朋友都认为高抒很怪——“你要搞搞啊……

别人搞，你不搞。你不就吃亏了吗？”
“我们中国人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对规则不敏感，对吃亏很敏感。”高抒说。
另外，谈到人情逼逼，高抒说：“全世界都有人情文化。但为了人情，搞得人沮丧沉重，就过头了。”
然而，高抒认为不正之风的根源，是管理而不是文化。高抒说：“现在所有的人都搞项目，没有项目活不了，因为科研单位考核要看项目和论文数量的。”

经常批评科技管理体制的尹卓委员说：“年轻人一入行就看出门道了：‘没项目，我就不能当课题组长，不能有成果，不能评奖。有了奖才能升副高、正高、院士……’纯洁的心灵就这样被污染了。他们开始想方设法走后门拿项目，当上课组长再把项目发出去——‘我挂第一作者，你挂第二作者。你拿钱，我出名……’”
“功利主义谁造成的？明明白白的‘法条’造成的！”尹卓说，歪风根源在于各种管理规定。
“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哪有这么多项目？”高抒说，“物资短缺时代，人就到外找后门，生活所迫。好比一个月只发半斤肉票，人就得到处跑，去弄肉。”
“慢慢地，人的精神没了，干一番事业的劲头没了。”高抒说，“本来人们是志在科学问题，才做科研的；如果为生存而战就不好玩了。”
(科技日报北京3月8日电)

科技厅长的两会日记

“中国制造”岂能被马桶盖打翻

周国辉

3月8日 晴，重庆转忧

每年“两会”都恰逢国际妇女节，女代表们格外靓丽、自信。下午出席第二次全体会议，女代表纷纷在大会堂前照相留念，个个盛装亮相。这一天理应完全属于她们。
大会主持人沈跃跃副委员长代表主席团向女代表和全国、世界妇女致以节日问候，全场掌声雷动。接着，听张德江委员长作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李建国副委员长作修改《立法法》的说明。人大会议进入第二阶段。
连日来，审议相当热烈，采访也是热度不减。出乎意料的是，马桶盖，一个平时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竟然因为一位名笔的博文，不断在会内外被提及。我在接受采访时就被无数次追问：你怎么看？说明了什么？丢了谁的脸？等等，你得不断解释，表明态度。
从东渡抢购日本马桶盖，到日本马桶盖其实是杭州造的，马桶盖“任性”地被反复讨论和诠释。我对善意且好奇的记者说，马桶盖就是马桶盖，不必人为地

去渲染和上纲上线，似乎变成了什么关乎“国格”和“耻辱”的事情。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岂能被这小小的马桶盖打翻。这是基本态度。
当然，一滴水能折射一个世界。从马桶盖那点事，确也告诉我们一些道理。一是中国制造的日用商品，从其功能和本质质量而言，已经不输洋货，应当有这个自信。二是中国制造应当杜绝山寨、减少贴牌，打造自主品牌。三是加强创新设计，不断适应人性化需要。四是创新商业营销，促进信息对称，引导和增强国人对国货的信任。
对此，浙江的企业界代表委员讲得好，品质是根本，营销是核心，自信是关键，三者缺一不可。我们要深刻领悟和贯彻“中国制造2025”，打响“浙江制造”的品牌。
昨天开放日的记者提问，我为什么谈及此事，因为对此我真的不屑一顾。
(作者系浙江省科技厅厅长)



3月8日，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在小组驻地进行小组讨论。图为医卫界别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妇产科教授王智能在会议间隙利用语音医疗网络平台在会议驻地无偿为患者进行在线义诊。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科研项目三年周期，钱怎么花却要一次说清，高校代表诉苦——这个科研预算我该怎么填？

本报记者 盛利

“去年，我申报了一个科研项目，3年研究周期内，使用材料的品牌、价格、数量，必须精确；连组织、参加学术会议的目的地、天数、人数，都必须提前估计。这个预算怎么填？”3月8日，宜宾学院发酵资源与应用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主任魏琴代表，向科技日报记者谈及自己申报省级科研项目的遭遇，真是有那么点哭笑不得。
近年来，国家、省市各级政府，强化科研经费管理，将有限科研经费落在实处、用在刀刃上。这得到了基层科研人员的欢迎。但魏琴也发现，随着项目管理愈发严格，项目申报中一些近乎苛刻的预算要求，背离了科研工作的实际。
去年底，魏琴申报了一份植物发酵研究的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不过，在该项目预算中，药品、化学制剂、耗材的用量，让她“很头疼”，“酒精、葡萄糖等常用基础材料，用量还能估算；但随着项目进行，需要不同的实验路径来完成研究目标，或者实验中的新发现、新探索，都可能用到计划外的实验耗材，这部分材料的品牌、价格、

数量无法预算，更无法列入项目开支。”
“更无法理解的是差旅费。我这个项目为期3年，却要在项目启动之初的预算表中，填写目的地、出差原因、天数、人数。这些谁也无法估计，但又必须填写。一旦不填写，却实际发生，就可能不能报账。”魏琴说，在过去较为“松散”的科研预算管理中，科研人员实际使用费用在“大盒子”不变的情况下，相对灵活；如今，在强化经费使用管理后，所有费用，从预算、到实际发生、到票据，必须完全吻合。
在魏琴看来，国家加强财政经费管理无可厚非，但科学研究具有不确定性，不该像管理行政经费一样管理科研经费，“科研工作充满不确定性，很多方面的费用支出内容确实难以估计。不要因为经费的僵化管理，影响了科研任务的完成，这就得不偿失了。”
“这要把握有一个度。”魏琴建议，“在预算合理且必要的情况下，只要没有发生违法违纪使用经费，虚报假账、揣腰包等情况，应该给科研人员更灵活的经费使用权。”
(科技日报北京3月8日电)

PPP模式让土壤污染治理不差钱？

本报记者 房琳琳

“修复污染土壤已经刻不容缓。”全国人大代表刘正军一直关注我国土壤修复进程，全国人大代表万连步也用“耕地地力后劲不足，土壤养分失衡，生态功能变差，污染日趋加剧”来概括现状。在2014年4月，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耕地污染问题最为突出，土壤点位超标率达19.4%。
3月7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记者会坦言：“良好的土壤质量是维护农产品安全和人民群众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保障。”
土壤修复作为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正事，多年来仍然面临日益严峻的境况。作为中国环境保护协会副

会长，刘正军对此深有感触。一朝污染，百年难除。“污染土壤的改良与修复是个系统工程。没有稳定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很难在短期内见到效果。”万连步说。
近年来，土壤污染的危害逐渐显性化，高层开始重视，相关立法、治理规划、试点项目陆续出台，土壤修复市场亦在启动中。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袁骞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说，“我们已经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土壤污染防治法制定工作正有序推进”。
实际上，对土壤修复的环保实践早已走在前面。刘正军作为环保战线的“老兵”，还是上市公司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中一家子公司专门致力于土壤修复。

但是，“目前制约污染土壤修复的最主要问题在于资金来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历史上虽然提出过‘谁污染谁治理’的要求，但是大多数造成污染的责任主体已经找不到了。那么，谁来出这个治理的资金就是一个大问题”。
拿重金属污染治理为例，从目前的行业情况看，专项债务的发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方政府支付问题，但从盈利模式看，仍然缺乏土壤修复资金的正向循环，即修复好的土地仍然不能较好地通过土地交易循环补充其他污染土地的治理资金。
为此，日前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指出，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创新也在积极探索之中，可以通过购买服

大医院床位率110%，基层医院1小时进1人，怎么办？王咏红代表为基层医院减少资源闲置支招

本报记者 王延斌

■代表委员访谈

“老百姓去不去基层医院，关键看人，不是钱的事，更不是行政命令能解决的。”对于国家卫计委副主任马晓伟的话，江苏省卫计委主任王咏红代表非常认同。在她看来，“解决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门可罗雀’的现象，关键是要建立起分级诊疗制度。”
王咏红说，这几年，江苏加大了对社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的投入，在硬件上100%达到了国家标准，但“硬件上的变化并没有换来信任，病人来得还是不多”。有一次，她专门到一家乡镇医院“暗访”，“一个多小时，只等来了一个病人，还是来转院的”，“我们还搞了一个调查，目前江苏大城市周边区县的患者，不管大病小病，

甚至感冒发烧，也涌向城市大医院，而三级以上的大医院床位率甚至达到110%。如何吸引病人到基层就医，这是一个难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完善分级诊疗体系。王咏红表示，今年初，江苏省被国家医改领导小组确定为首批4个深化医改综合改革试点省份之一，分级诊疗制度就是改革重点之一。
王咏红认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将基层医院“做强、做通、做顺”，“首先是做强，得让患者相信基层医生。在做大基层医院硬件建设的同时，加强对基层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王咏红表示，江苏正在探索“家庭医生”制度，“一个医生负责一部分人的医疗、预防、保健。家庭医生看完认为需要转诊，患者再到大医院去。”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做通，就是要打通基层医院和大医院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王咏红说，小病患者从大医院分流到社区医院后，可以降低小病的医疗费用，社区医院医疗资源闲置现象将得到改善；大医院由于康复期病人“压床”造成的医疗资源紧张矛盾也会得到缓解，大病到大医院也不会人满为患，看不上病。
“第三个方面就是做顺。通过医保报销、服务收费的经济杠杆作用，引导市民到基层就医，在基层报销比例比三级医院高20%左右，基层价格总体水平比县级医院低50%以上。”王咏红透露，江苏将对医保报销政策做出调整，探索建立逐级转诊制度，医保支付政策将进一步向基层倾斜，引导建立合理的就医模式。
(科技日报北京3月8日电)

不要加剧教育资源分配不公

本报记者 刘晓莹

“从前一些乡村学校的学生还有可能考上清华北大，现在几乎没有机会！”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国科学院委员会主委王元青在8日上午的小组讨论会上提到了这种教育不公平现象。发言还不过瘾，茶歇时间，他和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在走廊里继续热议。
王元青以内蒙古的一些乡村高中为例，按照规定，乡里的学费标准比起县里、城里要低得多。“比如现在在一个乡里的高中上学是300，县里可以收到800，一个学生平均就能差到500，而高中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政府又不能给你补齐这500块钱，学校收不上来钱，不

仅基本设施跟不上，就连优秀的乡村教师都留不住。”
“这个我非常理解，我们的教育体制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省级政府牵头、以县为主的管理方式，而中央财政首先保障的是义务教育这一块。”陈小娅说，“虽然高中也是公共产品，但是高中和义务教育的不同是你还需要有一定的付出，因为教育也是有成本的。这个付出还不能随便收费，是省物价部门、教育部门以省政府名义给不同高中设立收费标准，这也是现阶段的事实。”
“可是这个差异会使好的学校越来越好，差的学校越来越差，长期下去势必造成教育不公平，国家是

否应该有一些经费支持？”王元青追问。
“政府有相关的公共经费拨款，但我想到了乡镇下面也不会是每个学校都一样。”陈小娅说。
讨论到这里，一些记者围了上来。“2013年北京小学生均经费是2.1万元，河南却不到4000块钱……”没等记者说完，陈小娅便接过话茬：“并且我想即便是在河南省，郑州和某个乡，县肯定差距更大！”
“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了消除这种差距就把目前已经发展得很好的地区的收费标准给拉下来，毕竟乡里的学校要赶上这个差距确实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也不排除会产生差距越来越大的可能。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让这些乡村学校自生自灭，目前政府做的工作至少是‘托底’，国家也在不断调整教育布局，随着未来的发展，我们会朝着缩小这个差距的方向努力。”陈小娅说。
(科技日报北京3月8日电)

魏传忠委员：帮帮卖房子搞科研的人

本报记者 刘晓莹

“全球每年有125万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中国有11万人，其中有70%因制动问题丧生。”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魏传忠在8日上午的小组讨论会上说，“依靠全新的刹车原理研制出的平面叠合运动制动器可以大大降低此类风险，可他的发明者去年为了搞研发，竟然卖了房子！”
魏传忠说的是曾被列入北京市重大科技成果推广计划的停易制动器的发明者王庭义。据了解，基于直线运动及旋转运动两种简单运动模式，人类使用的传统制动模式分为盘式及鼓式两种。“盘式刹车磨损寿命短，使用周期中制动力会降低，美国和日本的大型车基本不用这种制动器；鼓式刹车较盘式具有成本低、寿命长等优点，但是刹车鼓在受热后直径会增大，造成踩下刹车踏板的行程加大，容易发生刹车反应不如预期的情况。”王庭义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而平面叠合运动制动器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基础理论——合成后的平面运动，它使接触面完全吻合，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刹车装置的制动力并延长磨损寿命。”
“不仅如此，传统制动器的电轴转动使汽车的霸位回位不好，平面叠合运动既有直线运动又符合旋转运

动，可以马上回位降低汽车能耗。”王庭义补充道。
而在魏传忠看来，这项技术最重要的是降低了PM2.5的排放，“传统制动方式在摩擦的同时产生摩擦件的局部磨损，由于磨损速度太快，且轮胎中含有纤维物质，摩擦片摩擦下来的灰中便含有这种携带短纤维成分的粉尘，它漂浮在1.1—1.6米的空中，正好是人呼吸的范围，是肺癌和矽肺病的致癌物，而新的制动方式是平面与平面接触，大大降低磨损面，产生的此类物质不及传统制动方式的三分之一。”对此，王庭义还为记者提供了一项调研数据：仅北京站一处，采用平面叠合运动制动器每年可降低至少五千吨这种致癌物。
尽管这一制动装置已经受到一汽、中通客车甚至德国奔驰的垂涎，但由于“在过去长期的研发过程中借了很多钱”，去年，为了研制出装卸过程简单操作的第三代产品——“傻瓜型”平面叠合运动制动器，王庭义卖掉了自己的房子。“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任何新的技术都需要一个产业化的过程，况且汽车制动装置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希望呼吁国家可以关注此类科技成果，别让科技工作者‘一个人扛’。”魏传忠说。
(科技日报北京3月8日电)